

车

水浒解识

欧阳健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水浒解识

欧阳健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解识/欧阳健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7
ISBN 978-7-5426-4629-3

I. ①水… II. ①欧… III. ①《水浒》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494 号

水浒解识

著 者 / 欧阳健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5.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29-3/I · 833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欧阳健，1941年8月生，江西玉山人。1956年5月参加工作，1968年以书写“反动日记”入狱四年，1979年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受“评《水浒》”触动研究《水浒》，1979年3月发表《柴进·晁盖·宋江》，提出《水浒》主旨“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观点；1980年5月发表《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对胡适的小说考证予以高度评价。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考试，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助理研究员。1991年起用辨伪原理论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的原本，而是后出的伪本，被《中国图书评论》称作“震撼红学的新说”。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调福建师大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记欧阳健先生(代序)

《文艺报》记者 冉利华

如果我告诉您,《水浒》其实跟农民起义并无多大关系;《红楼梦》写的也并不是什么家世之感,而旨在追忆平生所遇之青楼红粉;晚清小说也并非一味谴责,而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小说,应重新评价,您会作何反应呢?

事实上,这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认真、扎实、深入的研究之后,大胆提出的古代小说新见。这位学者就是欧阳健先生。

如今身为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所研究员的欧阳健先生,童年的理想是当作家。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他写了三百万字的日记。文革中,这些日记中的四五句话被抄家者歪曲,他便成了“反革命”,先是被拘留了四年,后又在农村监督劳动了四年。因此当评《水浒》运动开始,《水浒》遭到断章取义的批判时,他对施耐庵、对《水浒》的同情就不言而喻了。于是他开始了《水浒》研究,并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

他读《水浒》的办法细得真可谓之“笨”。他用拣来的香烟纸作卡片,不仅逐回写出《水浒》的情节提要,而且以人物为专题,把每个重要人物的出身、职业、言语、事迹一一细细考来,结果发现:在《水浒》中,对市民社会的描绘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拳打镇关西、卖刀杀牛二、怒杀阎婆惜、枷打白秀英、斗杀西门庆等情节,大都发生在城镇。在《水浒》人物——无论是令人痛恨的破落户,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身上,寄托的是市民强烈的憎和爱。《水浒》褒扬人们的最高标准是“仗义疏财”,而最受人推崇、拥戴的人物如及时雨宋江,其活动舞台主要在城市,其仗义疏财的主要对象也是市民。由此他推断:《水浒》其实既非农民起义的颂歌,也非农民起义的叛徒的颂歌,它与农民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它的精神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即反映封建社会里市民的思想感情。

欧阳健先生的《水浒》新论,是确立在文本的精细解读与文献的严密考证基础之上的,但也很大程度上受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三侠五义》时一段话的启发。然而,在他后来研究晚清小说并撰写《晚清小说史》时,他却并没有把“谴责小说”作为自己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而是大量查阅清代史料,广泛阅读晚清小说,深入探讨晚清小说创作繁荣之由,最后形成了如下的观点:晚清小

说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它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份爱国主义的答卷。其中很多作品既有丰富多样的审美韵味，又具高度的思想价值和深湛的认识价值，应当重新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实，欧阳健先生对晚清小说的兴趣，源自《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诱发。1980年，他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助理研究员，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1985年，他在文学研究所受命主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编纂。在1985年至1988年三年期间，他曾遍访北至哈尔滨、南至昆明、西至兰州的全国六十多家图书馆。最后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录的1164条、314万字的通俗白话小说提要中，由他撰写的条目就有395条51万字。在编纂过程中他发现，自唐代至清末，通俗白话小说总量为1164部，而晚清自1901到1911年十年中就有529部，几乎占了一千二百年总量的一半。正是这奇异的现象诱使他开始了对晚清小说的研究。而这一番艰苦的编纂工作使他接触到了很多古代小说的版本（包括稿本和抄本），这就为他日后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创造了前提。

虽然从事的是古代小说研究，但欧阳健先生不愿写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一是因为《红楼梦》太博大精深，二是因为红学界早已众说纷纭。然而1990年夏，他应邀在北京大学侯忠义、安平秋教授主编的《古代小说评介丛书》中撰述《古代小说版本漫话》后，他却不得不介入《红楼梦》版本问题了。然而稍一涉足，他却发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不仅错字、别字、缺字太多，抄本几处最关键的部位被有意撕毁，而且通篇不避康熙的讳，突然出现在清亡十六年以后一事也很值得怀疑。于是直接研读起《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来，并运用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基本规律，从版本鉴定和内容对勘入手，得出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论：“脂本”是后出的伪本，脂砚斋有关作者家世生平和素材来源的批语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真本。

欧阳健先生的版本新说一出，无疑在红学界激起了大波，并因此给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但他更加坚定了对自己研究的信心。他尝试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将作者、时代、版本、本事的考证同《红楼梦》文本的诠释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并因此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关于《红楼梦》文本的见解。本来，他根据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是一向认为《红楼梦》出自康熙年间的曹寅长子之手的。但因袁枚说过“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的话，“校书”是对妓女的雅称，而大观园中并无任何妓女混迹，所以他以为曹雪芹写的是实录性《红楼梦》，而小说《红楼梦》另有其书。在1997年10月与刘冬、刘福勤两先生的谈话中，刘冬谈到应从文学氛围去考察《红楼梦》的成书，刘福勤则猜度在《红楼梦》的创作中融

进了妓院生活的经验,大观园及活动其间的众女子都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这些观点使他感到新鲜,也多少使他对原先的想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后来,他翻阅《情史》,发现卷七“情痴类”《老妓》录有嘉靖年间“金陵诸姬著名者……青楼所称‘十二钗’”,又见清初《秦淮见闻录》中有“万历间有《十二钗女校书录》”之说,于是豁然开朗,开始确信:《红楼梦》与青楼文化有关。它与《板桥杂记》《影梅庵忆语》《桃花扇》等作品一样,也是在秦淮名姝所酿造的文学氛围中孕育出来的,[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就点明了“红楼”与“风月情”的内在联系。曹雪芹之所以把小说题名为《金陵十二钗》,就是因为小说中人物的原型确是秦淮青楼(红楼)名姬“曲中十二钗”之故。从曹雪芹“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等等表白可以感知,《红楼梦》创作的意绪内驱力,并不起于家庭败落之后对“繁华旧梦”的怀念,而起于“历过梦幻”之后对“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的追忆。这种见解,我们不妨把它当作《红楼梦》文本的“另一种说法”平心听来。至于欧阳健先生转换角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为红学开辟了一条新路的。

(《文艺报》1999年1月23日)

目录

记欧阳健先生(代序)/ 1

● 卷一 《水浒》解识 ●

《水浒》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之谜 / 3

《水浒》的简本与繁本 / 12

“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传神之作 / 23

《水浒》的结构和后半部的评价 / 36

《水浒》的研究情况 / 44

《水浒》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 48

● 卷二 人物剪影 ●

宋徽宗;高俅;洪信;梁中书;宿元景、张叔夜 / 53

王进;王伦 / 60

柴进;晁盖;宋江;杨志;鲁智深;武松;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李逵;卢俊义;燕青;朱仝、雷横;李俊;张横、张顺;杨雄、石秀;李应;解珍、解宝;史进;林冲;花荣;徐宁、汤隆;呼延灼、关胜;董平、张清;戴宗;王英、扈三娘;张青、孙二娘;孙立、孙新、顾大嫂;朱贵;时迁;李忠、周通;施恩;萧让、金大坚、乐和、凌振、安道全、皇甫端 / 63

田虎;王庆;方腊 / 120

阎婆惜;武大;潘金莲;西门庆;董超、薛霸 / 125

黄文炳 / 131

• 卷三 捍卫《水浒》 •

《水浒》的成书、精神与改编 / 137

兴化三大小说家论 / 152

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 / 162

• 卷四 作者探考 •

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1952 年文化部施耐庵调查成果评估 / 181

1982 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 / 195

《浙江通志》元代选举科目正讹——兼辨“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之由来 / 210

在纪念“1952 年中央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 周年和《施耐庵
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开场白与学术小结 / 230

卷一 《水滸》解识

《水浒》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之谜

《水浒》是中国古代文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体写成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想要找一个没有听过水浒故事，不知道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宋江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很少几部古代名著能够达到《水浒》那样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程度。

《水浒》巨大而几乎是永恒的魅力是怎样获得的呢？让我们先从小说的历史原型及其演变成长篇钜制的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说起。

—

说到《水浒》，人们就会联想到《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的记载，因而自然地把它看作一部据史敷陈的历史小说。胡适说：“……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人都是历史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离奇，遂成一部《梁山泊传奇》。”（《水浒传考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水浒》列入“元明传来之讲史”一类，说：“宋江等啸聚梁山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胡适和鲁迅对《水浒》的成书过程的表述是精辟的，所以一直为后世学者所认同；但他们所相信的宋江史实的真实性，以至于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看成《水浒》的创作原型或素材来源，却受到后来者的质疑。有关历史上的宋江的疑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宋江是否确曾“啸聚梁山泊”？查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的官私史料，关于宋江的活动地域，一般有“淮南盗”，“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东都事略·徽宗纪》）、“京东贼”（《青溪寇轨》）、“河北剧贼”，“转掠京东，径趋洺阳”（《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等记载，其他有关宋江的史料，如《折可存墓志》只说“草寇宋江”，《张叔夜家传》只说“群盗宋江”，没有一条说过宋江曾啸聚于梁山

泊的。

第二,宋江是否“其势实甚盛”?出于北宋史官之手的《宋会要辑稿》,并无关于宋江的记载,说明宋江之事影响甚微,故不值得在史书上留下一笔。《东都事略·侯蒙传》引侯蒙“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话,也许是侯蒙为招安张目的夸饰之词。其实,宋江只是一支小规模流寇,因此会败在一个小小的沭阳县尉王师心的手里(吴师道《敬乡录》)。有人估计,他们即使不止三十六人,“但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人,所以张叔夜能以一千兵收降了他”(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相比之下,与宋江几乎同时的张迪聚众数十万,高托山自称有众三十万,宣和七年招安张万仙等五万人,贾进等十万人,规模都远比宋江要大得多;更不要说王则、方腊这些在《宋史》中列有专传的造反者了。

“梁山泊聚义”的显赫声名之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完全是由于《水浒》的功劳。《水浒》的巨大艺术魅力,竟然塑造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它不仅使一般的平民百姓极其熟悉梁山泊故事,连史学家也把文艺当成了历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中说:“按《水浒》所说,他们起义的根据地是梁山泊,地在今山东郓城,宋江亦郓城人,……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他们行动的目标是打击官府,打击大地主,如林冲还有一种抗击契丹的要求和思想。这些记载,基本上应有所据。”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书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有人认为其中有关宋江的记载也是来源于“小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宋史》编纂之时,关于梁山泊的民间传说已经风行天下了。

追根穷源说来,《水浒》之将宋江同梁山泊连在一起,以及对宋江声威的渲染,又来源于宋元时代民间的“说话”。南宋末年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所收龚圣与(开)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是现今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宋江三十六人的记载,序中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

龚开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他在少年时,就已听到关于宋江的“街谈巷语”,起初还有点不敢相信,后来从《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得到印证,这才“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在他的《宋江三十六赞》中,三十六人都有了绰号,如呼

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混江龙李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青面兽杨志、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扑天雕李应等，绰号人名都和《水浒》完全一致；绰号不同的只有刘唐作“尺八腿”，呼延灼作“铁鞭”，索超作“先锋”，杨雄作“赛关索”，董平作“一直撞”，徐宁作“金抢班”等，又把阮小二与阮小五的绰号“立地太岁”、“短命二郎”作了置换。这类江湖上的绰号，肯定不会是正规史书上的记载，而只能出自民间的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江三十六赞》上，还没有出现梁山泊的字样，它提到的地名，都是太行山，如卢俊义赞：“风尘太行，皮毛终坏。”燕青赞：“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赞：“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赞：“汝何行之，敢离太行。”穆横赞：“出没太行，茫无畔岸。”到了《宣和遗事》，在叙事中方始把梁山泊与太行山混在一起。它先写李进义、孙立杀了防送军人，救了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又写晁盖等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后写宋江杀了阎婆惜，就壁上题诗四句：“杀了阎婆惜，囊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显出了由太行山向梁山泊的过渡的痕迹。《宣和遗事》大约出于宋人手笔，可能经元人增益。它的人物姓名，有的与《水浒》不同，如卢俊义作“李进义”，关胜作“关必胜”，李俊作“李海”，杨雄作“王雄”，张横作“张岑”，阮小二作“阮进”；绰号倒与《水浒》更为接近，如刘唐已经变成“赤发鬼”，索超已经变成“急先锋”了。

其后，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才一致将其定在梁山。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一段宾白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郛。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宋江三十六赞》、《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到了元杂剧中，也变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其声势就更盛了。元杂剧的水浒戏还有一个大的发展，这就是它公开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宋江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高文秀《李逵双献功》说：“宋公明替天行道。”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说：“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黄花峪》说：“虽落草替天行道。”这些都标志着《水浒》故事主题思想的深化。

梁山泊的“威名”为什么会“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离奇，遂成一部《梁山泊传奇》”呢？奥秘就在于梁山泊的“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的成书过程之中。

二

以《水浒》为代表的“白话小说”的出现和昌盛,是商业大都市日趋繁荣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北宋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随着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农业的空前发展,城市的私人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中古城市的厢坊制度逐渐趋于瓦解,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及城市居民为主体的市民阶级,获得了良好的气候与土壤,已经基本形成。鲁迅说:“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中国小说史略》)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娱乐需要,丰富多彩的诸般杂伎艺(包括杂剧、影戏、傀儡、诸宫调等)应运而生,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说话”。“说话”,就是讲故事(即今天的说书),在所有的形体表演艺术样式中,只有语言的容量最大、最不受固定程式的拘缚,可以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因此最适宜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种“说话”,是带有商业性的文艺行业,最重要的标志有三:

第一,有固定的演出场地——瓦子勾栏。如北宋的汴京就有新门瓦子、州北瓦子等(《东京梦华录》),南宋的临安,“自南瓦至龙山瓦,凡二十三瓦”(《南宋市肆记》),其中“惟北瓦最大,有勾栏一十三座”(《都城纪胜》)。

第二,有许多以“说话”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艺人。据周密《武林旧事》载,当时著名的“说话人”的艺名,有的叫“酒李一郎”、“故衣毛三”、“仓张三”、“枣儿徐荣”、“掇条张茂”等等,都是地道的市井艺人。

第三,有大批热情的为了娱乐而来的听众。《东京梦华录》说,瓦子“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有些听众甚至“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说话艺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其中最有地位、最为盛行的是“讲史”,讲的是重大的史事。据《梦粱录》记载,宋代市井说话的“讲史书”,主要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位讲史艺人王六大夫演出时,“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另一类是讲说现实生活故事的短篇说话,称做“小说”。小说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门类,产生了许多受人欢迎的节目。由于受到历史事实的拘缚,面对“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的小说,讲史难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他们“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小说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使讲史艺人放下架子,开始向小说学习,吸取小说的长处;另一方面,“小说”只是短篇的故事,“在小说艺术未臻完善之

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讲史的宏伟的规模,又是小说所不可企及的。这样发展下去,终于导致了“讲史”与“小说”的合流,“讲史”也好,“小说”也好,从此一概被称为小说了。

《水浒》就是酝酿于宋元间的说话艺术的产物。龚开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街谈巷语”指的就是“说话”。那么,在宋人“说话”艺术的家数中,“水浒”故事应该归于哪一家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水浒》故事并不归于“讲史”一类。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说:“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以“新话”和“史书”相对举,是很有讲究的。讲史书是据史敷衍的说话,后世又称为历史演义,意思是“演”史书之“义”。早在南宋年间,“水浒”故事就开始进入勾栏瓦舍的“说话”领域。从《醉翁谈录》记载看,当时盛行的“水浒”节目,属于“小说”(名“银字儿”)的范畴,还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其中有讲述杨志故事的《青面兽》(属“朴刀”类),讲述鲁达故事的《花和尚》、讲述武松故事的《武行者》(属“杆棒”类),讲述孙立故事的《石头孙立》(属“公案”类)等。在有关“水浒”的说话流行的时代,《宋史》尚未成书,宋江等人的故事,至多不过像岳飞、韩世忠的故事一样,算是一种“新话”,大约类似于今天的时事小说或纪实小说。

鲁迅在谈到宋代的文学时,对其时的“平民底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说话人生活在“民物康阜”的都市,又以市井细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他们不仅对于市民的心理有相当深切的揣摩,而且用的是市民所熟悉的、有生命活力的口头语言,在长期的讲述和传授的实践中,这种语言不断得到锤炼,逐渐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水浒》中那些最为精彩传神、刻画入微的章节,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汴京城杨志卖刀”、“宋江怒杀阎婆惜”、“供人头武二郎设祭”、“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等等,无不是市民生活的真切描绘,而且是最为纯熟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的结晶。由于说话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市井艺人,那些话本的作者也多是市民或寓居城市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市民社会的底层,与广大城市居民有相同的命运和思想感情,在他们的创作中,自然要借以表现市民的意志和愿望,甚至同情、赞扬他们反抗黑暗的斗争。《水浒》这部巨著,就是在这个时代酝酿、产生的,它是宋元至明初二三百年间许多人的共同创作的成果。它的作者是一大群,其中包括无名的瓦舍说话人、话本、杂剧的作者,他们是《水浒》的基本作者。

而当《水浒》进入以文字来加以记录、整理的阶段,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为了把那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联缀成一体,就只有借助于讲史的叙事方法,将那些

英雄故事贯串起来。《宣和遗事》的主体，是讲述北宋徽宗直到北宋灭亡的故事，其中“梁山泺聚义本末”一段中，就包含了《水浒》雏形。其节目如下：

杨志等押送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
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泺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看起来像是讲史，但其实并不是讲史，充其量不过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虽宋人所记，辞近譬史，颇伤不文”；或如郎瑛《七修类稿》所说：“虽以宣和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则被掳之事，首起如小说院本，是盖当时之人著者也”，是一种貌似讲史体的小说联缀而已。《遗事》主要讲了有关杨志、晁盖和宋江三个故事，其中提到僧人鲁智深，但语焉不详；武松的姓名在天书上出现，却没有写出他的具体活动；林冲有名，又只是与杨志一道押送花石纲的十二指使之一。

属于“小说”范畴的“水浒”故事，由于未曾得到文字的记录而影响了它的流传，接近“讲史”范畴的《宣和遗事》，又因过于简略而不能产生大的艺术魅力，这时候就轮到大手笔来发挥作用了。鲁迅说：“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违，于是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人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元末明初，施耐庵对梁山泊聚义的素材进行了提炼和加工，完成了《水浒》的再创作。施耐庵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在记录过程中被舍弃了的属于“小说”范畴的部分，亦即在“说话”艺术实践中久经锤炼的具有丰满的血肉的部分，重新以文学的方式添加到那已形成的躯干的骨骼上去，充实、丰富着作品的内容；一是按照“讲史”的要求，为《水浒》确定了一个结局。施耐庵不满意《宣和遗事》的“招安——立功——封侯”的模式，而选择了悲剧的结局。这两个方面的努力，都使《水浒》无